



汉语史中的 语言接触问题研究

遇笑容 曹广顺 祖生利 主编

 语文出版社

汉语史中的 语言接触问题研究

遇笑容 曹广顺 祖生利 主编

- 最早的佛经译文……遇笑容 (24)
- 历史上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融合问题说略……徐通锵 (49)
- 汉语和阿尔泰语互相影响的四项例证……罗杰瑞 (61)
- 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曹广顺 (68)
- 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曹广顺 (74)
- 北京官话溯源……曹广顺 (81)
- 北方方言中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包格式和来源……曹广顺 (88)
- 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曹广顺 (95)
- 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一) 梵汉翻译问题对音韵的中古新说……曹广顺 (133)
- 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二)……曹广顺 (154)
-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的接触……曹广顺 (163)
- 《老乞大》语序研究……曹广顺 (177)
- 中古译经中的处所词……曹广顺 (194)
- 试论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曹广顺 (207)
-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曹广顺 (222)
- 《百喻经》中的“已”……曹广顺 (232)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遇笑容, 曹广顺, 祖生利主编.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41-106-7

I. 汉… II. ①遇…②曹…③祖… III. 汉语史—语言接触—文集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2458 号

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

遇笑容 曹广顺 祖生利 主编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异 16 开本 23 印张 387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语言接触和通过接触对语言造成影响是语言演变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汉语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不断地与其他语言发生接触，其发展演变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过其他语言的影响。

在汉语史研究领域，较早注意到其他语言对汉语发展影响问题的，是王静如（1935）、吕叔湘（1940）等学者；1953年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发表《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一文，首次系统考察了中古以来受阿尔泰语影响形成的北方“汉儿言语”的发展、盛行及消亡的过程。此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沉寂。近年来这种情形逐渐得到改观，学者们开始重新认识和估价语言接触对汉语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

就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来说，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所造成的结果，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的机制。研究的热点是中古（东汉至六朝）汉译佛经和元白话这两个阶段。围绕着中古译经语言对中古汉语的影响和元代蒙古语对北方汉语乃至整个汉语的影响，近年来已有不少的成果发表。但总的来看，整个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对包括中古译经和元代蒙古语在内的这些语言接触过程究竟给汉语带来了哪些语法改变，还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目前加强汉译佛经、元白话研究，挖掘语法历史发展中的外来影响，是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发现事实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其产生的机制，社会历史条件与影响程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加以讨论。目前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对汉译佛经的梵汉对勘研究，和对元代白话文献与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也开始了对其中特殊语法现象形成机制的探讨。今后除了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之外，还应该更紧密地与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探讨作为一种动因，语言接触引发了汉语的哪些变化，这些发展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变化过程中它是如何与其他动因交互作用的。这些研究会为进一步揭示汉语语法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有所帮助。

如上所述，汉语语法史领域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为进一步倡导和推动相关研究，我们

编辑了这本论文集。论文集主要收录汉语语法史研究中语言接触领域已经发表的重要文章，以及两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与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系联合举办的“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问题专题研讨会”中宣读的部分文章。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可以基本反映现阶段汉语语法史领域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已经取得的成果，介绍目前较为成熟或流行的理论方法，为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提供一个前进的基础。

目 录

前言	(1)
----------	-------

关于汉儿言语

——试论白话发展史	太田辰夫 (1)
-----------------	------------

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	许理和著 蒋绍愚译 (24)
-----------------------	------------------

历史上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融合问题说略	徐通锵 (49)
-------------------------	------------

汉语和阿尔泰语互相影响的四项例证	罗杰瑞 (61)
------------------------	------------

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	桥本万太郎 (66)
-----------------	--------------

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	桥本万太郎 (81)
---------------------	--------------

北京官话溯源	林 焘 (102)
--------------	-------------

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

来源	梅祖麟 (115)
----------	-------------

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	余志鸿 (119)
------------------	-------------

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 (一)	辛岛静志撰 裘云青译 (133)
---------------------	--------------------

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 (二)	辛岛静志 (154)
---------------------	--------------

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	江蓝生 (165)
----------------------	-------------

《老乞大》语序研究	李泰洙 江蓝生 (177)
-----------------	-----------------

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	曹广顺 遇笑容 (194)
-----------------	-----------------

试论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	侯精一 (207)
--------------------	-------------

《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

《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	蒋绍愚 (222)
------------------------------	-------------

佛教混合汉语初论	朱庆之 (232)
----------------	-------------

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	祖生利 (256)
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李崇兴 (279)
再谈中古译经与汉语语法史研究	遇笑容 曹广顺 (287)
汉语负面排他标记的来源及其发展	胡敕瑞 (306)
移植: 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词汇的一种方式	朱冠明 (323)
也谈中古译经中“取”字处置式的来源	
——兼论“打头破”、“啄雌鸽杀”格式的形成	赵长才 (335)
从语言渗透看汉译佛经中的特殊判断句	龙国富 (347)
编后记	(359)

关于汉儿言语

——试论白话发展史

太田辰夫

I

朝鲜很早以来作为会话教科书使用的《老乞大》中可见到“汉儿言语”这个词，即：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奎章阁丛书第9，页3）

些少汉儿言语省的。（同，页3）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页9）

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页9）

他汉儿言语说不得的。（页92）

我汉儿言语，不理会的。（页138）

《老乞大》中的用例只有此处列举的五例，但此外还有“汉儿”“汉儿人”“汉儿伙伴”“汉儿小厮”“汉儿学生”“汉儿学堂”“汉儿文书”“汉儿茶饭”“汉儿地面”，共计16例。这种“汉儿言语”谚解中作“汉语”（第一例的谚解），又据小仓博士指出，《老乞大》的改订版《老乞大新释》（1761）及《重刊老乞大》（1795）改作官话^①。不过，“汉儿言语”这个词即使能够简单地换成“汉语”或“官话”，也还没有探明它的性质。既然还没有弄清楚这样的替换是否真的合适，那就有理由在这里斗胆提出问题^②，为此必须首先研究“汉儿”这个词的意思。

箭内博士在他的《元代社会的三阶级》文中引到《元典章》^③，其中有如下一段：

内中多是汉儿。汉人、女真、契丹达达蒙古小名里做达鲁花赤有，今后各投下各枝儿里说知，选拣蒙古人委付者，汉儿、女真、契丹达达小名里做达鲁花赤的，都合革罢了有。

这段引文中的小字夹注原文没有，是箭内博士加上去的^④，据此“汉儿”即“汉人”。那么“汉人”是那些人？《辍耕录》卷1氏族条对汉

人八种列举如下：

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求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女直同

这条记载，箭内博士作如下说：

辍耕录的编者在汉人八种中不举汉人应该说是极不合适的，又如后面所述，严密地说起来，汉人也有两种，曾在金国治下的中国人叫汉人，在宋治下的中国人叫南人，而且他们之间在待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据此而言之，汉人八种应当改为汉人十种。不过，对竹因歹等四种果真是部族名称否持疑，所以我们所说的汉人，只以汉人、南人、契丹、高丽、女直、渤海六种为研究对象。

以上作为博士的说法，狭义的汉人指金国治下的汉民族，广义的汉人不单指契丹女真等，还包括所谓的南人，但就宋以后的用例来看，汉人多与南人并举，汉人中包括南人的看法没有道理。后来的东洋史学研究中这一点似乎得到订正，如爱宕松男氏把元朝治下的诸民族按大类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种，汉人跟广义的所谓“汉儿”相当，包括以汉地为主并在其他二三处地方居住的契丹、女真、高丽人，即金朝旧管下的诸民^⑤。这样说来，汉人有广狭二义，“汉儿”也同样，《老乞大》中用的是狭义，《元曲选》似乎只于《酷寒亭》中有见，我体会吉川博士好像把它解作广义的^⑥。总之，说汉人也好，说“汉儿”也好，简言之是一样的，但似乎有文野的差别，即汉人是文语的，“汉儿”是口语的。而且可以这样认为，“汉儿”这一口语是老早就存在的，把它改成文语的是汉人。“汉儿言语”这种场合的“汉儿”，本来是狭义的，但把它作为广义的“汉儿”来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汉儿言语”看作是广义的“汉儿”间的共通语这样的看法比较合适。

II

元朝时“汉人”“南人”的区别决非元朝时始有，这一点已由赵翼指出了并为人所知^⑦，但对“汉儿”这个词从来没人考察过。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词作稍详细些的叙述。“汉儿”这个词似乎早在北朝就开始使用，如有名的“折杨柳歌辞”中即可见到：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而且北朝的史书中屡屡可见，如：

神武曰…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北史卷六，又北齐书卷1）

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北齐书卷21，北史异文，无“汉儿”语）

长鸢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北史卷32，又北齐书卷39，缺“州”字）

孝征汉儿，两眼又不見物，岂合作领军也。（北史卷47，又北齐书卷39）

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北史卷28，北齐书卷50，缺“多事”二字）

上引最后一例《资治通鉴》（卷171）亦引，胡三省注如次：

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

可是阿那肱所说的“汉儿”指的是一个叫源师的人，他是鲜卑秃发氏的后裔，无疑是胡人。这说明北朝时胡汉的区别并非靠血统，而是依据其文化教养如何，这种情况值得注意^⑧。这样说来，北方中国的汉人或汉化了了的北方民族被称作“汉儿”，与此相对，江南的汉人被称作“吴儿”。下面援引若干例句：

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晋书卷94，夏统传）

使还，孙腾谓曰，何意为吴儿所笑。（北史卷81，李业兴传）

高祖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北齐书卷24，杜弼传。北史卷55缺“儿”字）

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世说新语卷2·政事。又太平广记卷253也引用，“足”作“答”，“曰”作“云”）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洛阳伽蓝记卷2）

时代可以追溯很远。关于“汉儿”一词的起源，有如下的说法：

《事物纪原》卷10“称汉”项^⑨

演义曰，今俗骂人曰汉，盖晋末胡乱中原，故胡人骂中国曰汉儿，南人骂北人为胡为虏，华夷自太始太素已还，有国号者至多，独以汉名，曰取两汉盛者也。

《古今事物考》卷8，“汉”项的文字跟上面所引几乎相同，亦引来作参考^⑩。

苏氏演义曰，今俗骂人曰汉，盖晋末胡乱中原，故胡人骂中国曰汉儿，南人骂北人为胡为虏，华夏自古有国号者至多，独以汉名，取两汉盛者也。

《询芑录》“汉子”项^⑪：

汉武帝征伐匈奴，二十余年，马畜孕重堕殒罢极，闻汉兵莫不畏

者，称之为汉儿人，又曰好汉，自后为男子称矣。

这一说把“汉儿”的起源追溯到汉武帝的时代，但那时的文献中未见到“汉儿”一词，不一定可信，还是出于五胡十六国的说法为妥吧。

后来由隋朝统一了中国的南北，唐继续保持这一局面，但即使在唐代“汉儿”“吴儿”的称呼似依然通行。下面举一些笔者注意到的用例：

银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儿。（贺知章，答朝士）

银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顾况，和知章诗）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司空图，河湟有感）

成都府出小驹，以其便于难路，号为蜀马，今宣城郡亦有小马，时人皆呼为宣州蜀马，语习不悟，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时，时人呼姚丞相为陕州吴儿。（资暇集，顾氏文房小说本）

坤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汉儿喜饰说，毋多谈。（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

另外，在日本有所谓“汉音”“吴音”的名称，它的基础也植于这种自南北朝至唐五代间吴汉的区别，但在中国的资料中尚未检出用例。

接下到了宋代及与之大体同时代的辽金时代，“吴儿”的称呼似不再被使用，但“汉儿”一词尚极普遍地通用着。《辽史》中似未见到“汉儿”一词^⑩，自可见到“汉儿司”“汉儿行宫都部署”“汉儿行宫副部署”等官衙名，无疑当时是使用“汉儿”一词的。可以这样认为，《辽史》把“汉儿”这样的口语词改写作“汉人”，但固有名词不宜作这种改变，所以按原样保留下来了。《契丹国志》中可见到数例“汉儿”，较早的有会同九年（945）的记事：

又谓群下曰，汉儿何得一饷眠，自古但闻汉和蕃，不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大金国志》中所见之“汉儿”达到更多的数目，举例略去，这里从《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三朝北盟会编》中见到的“汉儿”一词多到不胜枚举的地步，只举足以了解“汉儿”性质的重要例子。其中之一是卷23所见的如下记事，可知“汉儿”是可以被看作“番人”的^⑪。

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贍之，虽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久之仓廩不足，以饥而怒，出不逊语，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怨，道路相逢，我军骂侮之曰，女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也，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

又同书卷232所收绍兴三十一年（1161）9月29日的招谕指挥谓：

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一应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

这里把“汉儿”和宋朝支配下的“中国人”区别使用。此处所说的“中国人”由金朝来说就是“蛮子”。“蛮子”一词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

元代“汉儿”的用例没必要列举，故从略，只想举朝鲜资料中见到的，如《高丽史》卷44，恭愍王23年（1373）所见：

它不会说汉儿言语，把这高丽人每绑了手脚，撇在水里……见达达说达达话，见一般火者说高丽话，见汉儿说汉儿话……

吏文中亦可见到，因而《吏文辑览》也收入了，但只有下面的例子^⑬：

汉儿，即汉人也。

III

唐宋以降的文言文大体以周汉文章为轨范，但词汇也好语法也好都不可能全数为唐宋以后的文言文所继承，所谓的僻词废义被淘汰，它的最大公约数才在后世留存下来。口头进行的说话和文章之间能够看出差别，这是不问古今东西都存在的现象，并不值得特别地惊奇，但口语和文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离的却存在问题，有必要提出具体的而且是系统的例证。通常认为到后汉时口语和文言之间的差别似乎已经产生，这从后汉的文章中有一些跟后世的口语（即所谓的白话）一致，相反跟文言不一致的成分上面可以推测出来。这样一来，口语和文言渐渐地分离开了。从整体来说，口语在文献中得到表现的机会不是很多，但不管怎样，文言常常受到口语的影响。要想在文言文中防止口语因素的混入是很困难的，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拒绝口语反映到文章中去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如此，概而言之，在文献中记录下来的口语还是相当贫乏，不容否定这种记录不足以反映出口语来。诚然宋代以降出现了相当口语化的作品，但它们不管怎么说还是作为旁系而存在的，不能看作中国文章的主流。现在只就作为主流的文言文来看，假使能反映口语的话也肯定是在对话的部分，而不是叙述的部分。于是进一步考察它的对话部分

看看，可知大致有两种场合。其一是说话人或听话人有无教养，无教养者的场合表现口语的地方多。另一是感情状态，说话者感情平静的场合表现口语的地方少，感情激昂的场合，比如发怒，或极度高兴，或戏谑玩笑时，表现口语的地方就多。把这反过来，自然不能说那种场合必定有口语的表现，但口语若有所表现的话，必定在上述那样的场合，这种断定不会有太大差错，从来在中国说明语言和文章乖离的场合，总要援引《易》中所见的孔子的话“书不尽言”，或《左传》中出现的同是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可是这些话即使能够说明文章一般地不能反映口语的理由^⑭，也不能说明如上所举那样尽管很少却有口语表现的情况。因此，若是把着眼点放到上述那样反映口语的方法上考虑其理由的话，那理由恐怕是这样的，在中国的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们在稍微正式一点的会话中尽可能地避开日常家庭内使用的口语，而使用跟写文章时用的语言相近的话去跟人谈话。简言之，文言是社交用的语言。在会话中使用文言，即使在文言跟口语距离不那么大的时代，也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第一，缺乏教养的人做不到；再者，感情激动的场合也难于做到。可是对于有教养的人们来说，选一个心平气和地平静讲说的机会绝不是不可能的。第一这并非外国语而是本国语言，第二过去在中国所谓有教养就专门集中在文言文的阅读和写作上，因此随意地把学得的文言词汇联缀在一起用到会话中，对语法简单的汉语来说，绝非像日本人所想象的那样困难^⑮。这里所说的文言，自然指作为文言文素材的语言，而不是指文章乃至文学。因此假如举出具体例子的话，那将不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若是想到史书等所见的浅近的文言的对话，那倒是最近情理的。

像这样，在文明主义的汉民族的社会中，懂得而且能够写文言文不仅仅是知识人的必须条件，同时作为其素材的文言（或者是尽可能接近文言的话语）也用于口头语，要求他们能够用文言说并听得懂，这一点迄今尚未被注意，有必要再就此点作稍详细些的论述。

IV

明治时代的标准会话教科书《官话指南》（特别是其官话问答的部分）和昭和以来彦根高商的白廷贵氏的会话教科书（有数种）的某一种都可称得上非常文语的，假如有人读到这些话，那是无论谁都可感觉到的吧^⑯。这样的话，无须再说，决不是架空的东西，而是现实中存在的。例如蒋光慈的小说《田野的风》（1932年出版）记叙了乡绅

的会话，如：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如果诸位有何善策，李某无不从命。……

此人不除，恐怕吾乡永无安息之日矣！……

诸位既然相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苟有事故发生，尚望大家共同负责。……

我们特为求教而来，非有别意，望敬翁万勿误会。……

而且书中还写道，说这种言词的时候，须摇晃着头，用朗读古文那种腔调说出^{①7}。这里引用的句子混入了若干口语的因素，其前后的文句也某种程度地在口语中掺杂着文语。这是在音韵体系变得非常简单，结果同音字增加，而且口语和文语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的现代所进行的对话，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不能不为其相当文语化而吃惊。用这样的文语被称作“转文”，因而这种拿腔拿调的态度被称作“文诌诌”。清代作品中，试着翻一翻《红楼梦》就可以知道，那里面女性和小孩和奴仆人等使用地道的俗语，与此相反，北静王和贾政及其他贵族士大夫们在正式场合所作的对话非常接近文言。首先举文语的例子：

北静王见他语言清朗，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谅也！”贾政陪笑道：“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余恩，果如所言，亦荫生辈之幸矣。”（红51回）

其次举口语的例子，这里引用的是贾府里掌实权的凤姐在家庭内对她丈夫贾琏说话的场面：

凤姐道：“我那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儿。况且又没经过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点不舒服，就嚇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那里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偕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天。我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应了，只得从命，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你明儿见了他，好歹赔释赔释，就说我年轻，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了他呢？”（红16回）^{①8}

明代作品中就反映口头语这一点来说，怕是无出《金瓶梅》之右吧。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2这样说：

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内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婪，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

能达到这样程度，只有它的对话忠实于口头语才有可能，但口头语不止限于口语，也有文语，这只从下面一例便可明白。这是一位名叫蒋竹山的医生对李瓶儿说话的场面：

不瞒娘子说，小人内为失助，中馈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无，倘蒙娘子垂怜见爱，肯结秦晋之缘，足称平生之愿，小人虽衔环结草，不敢有忘。（词话本第17回）

更进一步回溯时代，把目光转向元代，《元曲选》中有《偈梅香》一剧。这个“偈”即“文诌诌”的“诌”，女主人公是位侍女，某时在王公大人宅内使役，“俗语”一点不用，尽以“文谈”应对，因此人人都赞赏她。（楔子）原先作为知识人才能做到的事，由一个奴婢身份的人来做了，这说明即使在元代仍通行用文语来会话。

那么唐代如何呢？这里从趣味极深的具体例子入手。这就是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所见的如下记事^①。

（前略）正郎省礼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爱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

并且后面有夹注：

已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

这部分的夹注除鲍廷博的一条注之外，其他全可看作作者的自注。据此，作者是把这句话作为口头语原样记录下来的。但这句话除末了的部分外大体为文语。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唐代的知识人大概是用这样程度的文语自由交谈的吧。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推测，笔者又采取另外的办法。这就是试着从对话的文章中捕捉相当于“自身不懂文语……”或“你那样地滥用文语……”那样的表现。可是古时没有跟现在的“文语”相当的词。跟它相近的有“书语”“书言笔语”等，但这大约是文章中表现出的技巧性措词的意思吧。不过，因为它不可能是口语，就结果来说，跟文语的词句就没有多大差别了。

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人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重，更无余语，但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但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坂者，北邙山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蓄锦朝堂决杀之。（朝野金载卷2）^②

饼铺出身的这位御史的话真是奇怪不可解之言，勉强翻译的话，是否可这样译呢：

意思不懂的话没有用，让黄泉路上的人活着回来，如果不接受手铐脚镣的话，叫他吃孟青棒。

确实，这句话作为表达来说是很俗气的。但作为语言来仔细推敲的话，只有“你”这个词和“但”的用法具有口语因素，其他都没有达到作为文语不能使用的程度。这样看来可以想象，以这位侯御史的眼光来看，囚徒的“书言笔语”应该是更加文语化的。下面引“书语”的用例。

建绪遂行，开皇初来朝，上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隋书卷66）

这是隋高祖（文帝）和荣建绪的问答，说自己不解书语的文帝的话几乎就是文语（“不”用作疑问句终词是口语性的），由此也可以推测，像这样程度的文语是作为口头语，而且是平顺的口头语而通用的。《隋书》卷70叙宇文文化及的话里也提到“书语”这个词。

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富贵累世，至妻公主，光荣隆显，举朝莫二，荷国士之遇者，当须国士报之，岂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因众叛，躬行杀虏，诛及子孙，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规篡夺，污辱妃后，枉害无辜，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祐，拥逼良善，将欲何之，今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化及默然，俯视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

李密的这些话，除了开头和结尾恐怕不是口头所述，从“至妻公主”那儿起到“将欲何之”止过于骈文化了，大约经过了相当的修饰^③。尽管如此，李密所说的原话还是相当文语化的，这一点恐怕不会搞错。时代有前有后，但只要是不识字的人说的话，也能够作为推测的手段。为此打算再举一例：

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新五代史卷32, 王彦章传)增注(1)

这里作为使用俚语的例证,特笔大书“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这一谚语。就我们的常识而言,这种程度的语句为什么作为无教养的证据而被举出,真是感到不可思议,那么当时有教养的人们说的话都是文言喽。还有从敦煌发现的“辞仪”之类,据那波博士介绍^②,那里面所收的问候的话跟旧中国的尺牍没什么不同,是用文言修饰的语句联缀起来的。这也是文言作为社交用语而被使用的证明,因此顺便在这里一并记叙之。

V

在中国,跟现时期的口语确切相当的词似不存在。它是“俗语”同时又是“方言”或“乡谈”“乡语”。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记忆中,曾有一位是“北京官话普及会”成员的“满洲”高官赠我一幅匾额,上面写着“普及方言”。从把北京话作为标准语一方来看,这种提法是很奇怪的。那位高官的想法,并不是把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来采用的意思,而是认为口语就是方言。这样的事,只要稍微了解文语不管是写的话还是说的话都能确保其作为标准语的地位,就可以理解了。在这种状况下,口语不单单是缺乏被记录的机会,它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抑压。这是通贯中国各时代都可以看到的倾向,就中以两汉、魏、晋的贵族社会尤为显著。但经过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期进入南北朝的时代,中国的主要部分处在北方民族的统治下。这些民族和若干王朝概而言之都被看作是粗暴的,主要因为他们是和文明主义的汉民族不同的朴素主义的民族。他们对汉文明的态度也不一样,特别是在北齐和北周,跟北魏不同,似乎醉心于汉文明的情形较少。这种倾向从他们对本国语的态度上就显明地表现出来。首先是北齐,鲜卑语的通行很明显,当时的宣传号令中都把鲜卑语作为必要的。下面摘取《北齐书》中有关的记事以见:

孙搴…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北齐书卷24,孙搴传,又北史卷55)

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北齐书卷39,祖珽传)

高祖自身也多用鲜卑话,但也懂得华语。

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悼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卷21,高昂传)

10 由于这种原因,鲜卑语对当时的北人来说是一种教养,也是出身立世之